

■纪念

## 永远的绝代风华

——悼廖静文女士

□赵畅

6月17日上午10时许,当浙江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杜金康将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已于6月16日去世的噩耗转告我时,虽知廖老年事已高,仍觉悲痛难抑。

我与廖老先后见过两次面。我清晰地记得,2009年12月,应杜金康先生之邀,她与其子徐庆平来浙江上虞。作为宣传部长我参加了接待工作。其间,我陪同他们参观上虞的城市建设,还向他们介绍上虞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概况。尤其当我向他们介绍到“舜会百官”、“曹娥至孝”、“王充论衡”、“东山再起”、“英台情深”、“白马春晖”等一个个人文历史的传说,故事时,廖老赞不绝口,并让杜金康准备笔墨。一俟笔墨就绪,宣纸被平整地铺在专用的毡毯上后,她稍作思考便在宣纸上挥笔写下了“舜之故乡,文化辉煌”的题词。虽短短的八个字,却让人见证了她那颇具文人书法神韵的功力——要知道,其时她已是一位86岁高龄的老人了。写毕,她还跟我说:“上虞这几年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如此之快,就是得益于历史文化积淀的深厚,同时也是因为各届领导班子重视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你们搞文化的人,身上的担子可重呀!”她边说边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我既感到亲切与欣慰,又感受到肩上突然平添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当天共进晚餐时,杜金康将准备出版一本他收藏的书画精品集子的想法告诉廖老,想不到,廖老竟“毛遂自荐”:“那就让我给你作序吧,一来我还熟悉书画艺术,二来我对你的书画收藏情况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考虑到廖老年事已高,杜金康嘱我为廖老先起个序的草稿。廖老虽然同意了,但她似乎还有点不放心,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把杜金康先生的收藏智慧、收藏精神写透、写到位。否则,只是花更多的笔墨去写花了多少钱,收藏了多少有名气的书画,以后可以增值多少倍,这样的编辑思路和收藏观会严重误导收藏。而今想来,廖老当年之所以强调收藏智慧、收藏精神,该是与她的收藏意识、收藏品质一脉相承的。不是吗?当徐悲鸿去世以后,廖老毅然将家里的钥匙送到了文化部部长手里,让他们派人到家里接收。她共捐出徐悲鸿画作1350多幅,还有徐悲鸿收藏的唐宋元明清以及近代像齐白石、傅抱石、李可染、吴作人等大家的作品,包括万余件珍贵的碑帖、国外出版的图书、图片,并捐出北京的一套寓所用来建立徐悲鸿纪念馆。廖老说过:“这些全是悲鸿留下来的,我不能自己拿着,捐给国家是为了纪念他,也是给国家保存文化遗产,这是悲鸿活着时对我说过的话,就是他的思想。好多他收藏的画,都是我陪他到琉璃厂买的,他买这些画就是为了保护国家的文化遗产,我接受悲鸿的意思,完成他的愿望。”难怪,说到写序,廖老的脸色便一下肃了起来。

与廖老的第二次见面,则是在2013年的9月。其时,我早已转岗至政协工作,但因为兼了上虞政协虞舜书画院院长的职务,更因为曾接待过廖老,所以我有缘第二次同她见面。

2013年9月26日,是徐悲鸿逝世60周年。由上虞市人民政府、徐悲鸿纪念馆主办的“徐悲鸿精品画展”在上虞开展。年届90高龄的廖老和其子徐庆平、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等出席了开幕式。

要知道,在县市一级举办“徐悲鸿精品画展”,这尚属首次。说及在上虞举办这次画展,廖老曾告诉我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几年前我来过上虞,对上虞的建设发展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上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各届领导班子重视文化,百姓懂得欣赏,到这里办展,悲鸿在地下知道了也会高兴和答应;二是我在上虞结识了不少书画界和收藏界的朋友,特别是杜金康先生的淳朴为人和收藏精神,以及他多次动员邀请我携悲鸿精品画作来虞办展,我被感动了,也觉得盛情难却;三是因为我的祖先是浙江人,我对浙江自然有着特殊的感情。”然而,更让廖老始料未及、喜出望外的是,上虞市市长王慧琳向她汇报徐悲鸿与上虞还有着另外一段渊源时,廖老竟变得像小孩似的急不可耐。原来,徐悲鸿曾与享“北南开,南春晖”美誉的春晖中学首任校长经亨颐交情深厚,两人曾一起合作创作了《竹石图》和《竹枝母鸡图》等著名作品。“那就更说明我们这次到上虞举办画展,是办对了,办准了嘛,哈哈……”廖老的笑声是那样的爽朗,一直在展览场馆内回荡,也自然把在现场参观的观众们感染了。

廖老的这一“笑”,也“笑”出了她的率性、她的平易近人。其实,在生活中,廖老颇为风趣、幽默。展览期间,她去一家公司参观,并在公司食堂就餐。席间,张玉凤见丈夫爱民多吃了几块红烧肉,就劝他少吃点。想不到,廖老替刘爱民“打抱不平”:“男人嘛,就是要吃肉,胖一点,显得更健壮。不怕,多吃几块!”说这话的时候,只见廖老脸上似乎毫无笑容,但她不经意间瞪大眼睛朝张玉凤一瞥的细节,终究把我们一桌人都给逗笑了。自然,连张玉凤也挡不住这样的幽默,她赶紧自找“台阶”,笑呵呵地对丈夫说:“廖老说得没错,今天你就放开肚子吃吧!”这时,才见廖老又爽朗地大笑了起来。

席间喝茶时,我还发现了廖老的另一个秘密:她的脸上稍稍化了点淡妆。她那依然健朗的身材,随着年岁增长而增长的特有气质,加上这一点点恰到好处的淡妆,无疑就是她每一次出场都让人惊艳的原因。我想,她这样的气质打扮,或许就是她当年与徐悲鸿的特别约定,或者说,廖老不想让自己早已定格在徐悲鸿心里的形象有太大的折损——尽管他们早已天各一方,但他们依然深深爱着对方,他们又何曾离开过对方?事实上,在展览馆里,我似乎一直被这样的情愫吸引着,被这样的氛围浸润着。我知道,在展出的50幅精品画作中,其中有不少都写有“爱妻静文保存”这样的文字。廖老告诉我:“这些画,是悲鸿精心创作的,只要是我喜欢的,他就会立刻在画上题字,送给我。”以至于徐悲鸿逝世后,廖老一直不喜欢别人称她为“徐悲鸿遗孀”,而是喜欢也习惯了别人称她为“徐悲鸿夫人”。她经常跟人说:“我不仅爱徐悲鸿,也是他的崇拜者。”廖老被评价为“一个为徐悲鸿而生、为徐悲鸿而活的女人”,其忠贞不渝、伉俪情深,可见一斑。

据说,廖老走的时候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或者“最后愿望”。我想,作为陪伴徐悲鸿走到最后的人,她也许已了无遗憾。“她走得安详,很平静”,这总算让我们有了些许宽慰。想起徐悲鸿逝世50周年时,她动情地说过:“如果真的有黄泉,百年之后我和悲鸿能再见面,我要哭着把头靠在他的胸前,向他诉说这50年来我对他的思念。”如今,廖老已经驾鹤西去,我相信她一定在“黄泉”见到了徐悲鸿,也一定“哭着把头靠在他的胸前,向他诉说这50年来”她“对他的思念”。

■讲述

## 我与《中国作家》

——怀念主编冯牧老师

□王朝柱

30年前,中国的大门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打开,西方各种文化思潮不可阻挡地涌进神州大地,封闭有年的文学艺术家们蓦然放眼,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模仿着。为适应、催生文学艺术百花的盛开,各种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相继创刊。《中国作家》也应运而生。

也就是在这前后,我历经痛苦的思索,毅然决定弃乐从文,在不惑之年改行当作家。或许我坚信主编决定着报刊的风格和品位,因此,我在文学期刊林立的百花园中,惟独钟情于以冯牧同志为主编的《中国作家》。

冯牧的评论一直引领着新时代的文学潮流,他对作家、作品的点评是那样的中肯,令绝大多数作家信服。我还清楚地记得,很多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中青年都想拜见当代的“韩荆州”冯牧。说句老实话,我这个半路出家的“文学和尚”不仅想拜见冯牧,而且还想在他主编的《中国作家》上发表自己的处女作。

“文革”中期,我被分配到总政文工团创作室专事作曲,大作曲家时乐濛就经常说起当年鲁艺的同学冯牧的才华和趣事。后来,文工团的领导魏风真诚地对我说:“你如果有意拜冯牧为师或求教,我可以当引荐人。”

我听后实感意外,有些难为情地答道:“谢谢首长!随缘吧。”

或许是天遂人愿,就在《中国作家》创刊不久,我就见到了冯牧主编。

那时,为纪念建军60周年,我参加了大型话剧《决战淮海》的创作,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就在这一片赞扬声中,我们多么希望有关专家能审看话剧《决战淮海》,使我们从艺术创作的层面听到真实的批评意见。不久,时任总政文化部部长徐中把冯牧等评论家们请来了。出我所料的是,他一见面就说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我深知创作史诗性的作品的困难,所以当我来看这个戏的时候,就坦率地要对我讲话的同志说:我曾经怀疑过,究竟能不能通过一部话剧,或者一部故事片,或者一部小说,就把淮海战役的历史进程及其丰富的生活内涵深刻地全面地反映出来……我们曾出现过不少反映我们的革命历史题材、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文艺作品,但是它们当中的多数,同我们所期望的那种既有丰富的生活容量和历史概括性,又有高度艺术质量的史诗式的作品相比,无疑还有相当的距离。

我听了这段话就像是迎面浇了一盆冷水,从身上到心里连一点热乎气都没有了!但是,当我冷静下来再一品评这段话的深层含义,遂又禁不住地暗自说:“大家就是大家啊!”话又说回来,《决战淮海》毕竟是我改行后参加创作并问世的第一部剧作啊。

冯牧看了《决战淮海》以后十分高兴,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人,也讲了几句鼓励的话。令我感到惊喜的是,几天之后就在报纸上见到了他写的长篇剧评《史诗性的作品是必定会出现的》。他在文中十分坦诚地写道:“我觉得自己的某些观点大概要改变了,我开始感到,今天,出现史诗性的作品的现实是存在的。”同时,他还在文中洋洋洒洒地讲了古今中外各类史诗性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学艺术家的修养等等。多年之后,我曾感恩地对他讲过这样一段话:“您或许不相信,当年您对《决战淮海》写的那篇剧评我读过很多遍,其中关于史诗性作品的议论,对我的创作可谓是用终生。”

随着我和冯牧交往的增多和感情的加深,我们二人逐渐地变成了忘年交,他叫我柱子,我尊称他为老师。有一次我和他说起话剧《决战淮海》荣获全国最佳编剧奖的时候,他微微地点了点头,接着又说了这样一句话:“很遗憾,《中国作家》不发表文学剧本,不然刊登在《中国作家》上该有多好啊!”

我告诉他,徐中同志把《决战淮海》的文学剧本推荐给《解放军文艺》发表了。但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是:话剧《决战淮海》的文学剧本能在冯牧老师主编的《中国作家》上发表该有多好啊!

## 廊桥咏归

文/苏沧桑 图/范敏姿

这是2015年6月,江南的黄梅雨季开始了。当我们穿过一场大雨抵达浙江最西南的庆元县,踩着苍苔,爬到森林深处一条溪流的中游时,朋友指着两个巨大的水坑对我们说,你看,冰臼等了你们2.5亿年了,你们才来。

庆元近2000平方公里的青山绿水间,掩映着300多座古廊桥、古窑址、古地道以及浓墨重彩的诗书辞赋、唱词戏曲……有一种遗世独立的静与美。我们穿过廊桥时,并没有惊扰到那些老人,他们在躲雨,聊天,声音很低,但有时会有一阵笑声,惊起几只雨燕,也惊起一幕幕过去的时光,人们在廊屋里祭祀、聊天、打牌、看戏、约会……一位老太太和一位老伯在离人群稍远一点的廊凳上并肩坐着,她递过一颗杨梅,说了句什么,老伯仰天大笑,看上去他们不像夫妻,像常见面的青梅竹马,或两亲家。

后来,又遇到很多老人。月山村几乎看不到年轻人,两位老人在家里准备晚饭,巨大的铁锅里蒸着一碗米饭,他86岁,她81岁,老太太扎着两根细细的极精致的白发小辮子,老头说他们每年都在村里的“春晚”上表演补衣服、做鞋子。她最近去过县城,她

最爱唱的歌是《东方红》,后来她唱了,脸上浮起少女般的红晕。走时我说,祝你们健康长寿,她露齿也哇啦啦啦的。朋友翻译说,她一定要我们留下来喝茶吃晚饭,说吃了长寿。

800米深山里的西洋村,住着30多位留守老人,黄土墙黑土瓦,云雾缭绕,美若仙境。每一位老人看到陌生人都会笑,说,路滑,走慢点啊走慢点。一位健硕的奶奶正往小孙女嘴里喂饭,说,儿子和过来的越南媳妇都出去打工了。

古老的桥和村,从容的老人,让我脚步放慢,心变得安宁,却又有点不是滋味。朋友说,为保护这些古村,他费了很大劲,政府也费了好大劲,可是老百姓也想住新楼房,吹空调,儿女回来才能待得住。审美与生活,永远的矛盾。我们有什么权力让他们原地不动,供我们消费他们的古村从容?

我忘了几乎所有廊桥的名字,我想它们共同的名字叫“故乡”,所有故乡共同的名字叫“老人”,每一个“老人”心里都有两个声音——一个是:走吧孩子,走得更高更远,更有出息。一个是:归来吧孩子,让我们一起在故乡的廊桥下慢慢老去。

无遗憾地说:“柱子,《中国作家》以发表中短篇小说为主,你写的都是像一块又一块砖头似的长篇著作,很难在我们《中国作家》上发表啊!”

“谢谢老师,不用急,等机会吧!”

有人说我的命好,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且一定会干成什么。万一遇到天大的困难,也自有贵人相助。我记得就在我的作品研讨会召开不久,突然接到冯牧老师打给我的电话,要我立即到他的家里去,说是有救场的事情请我帮忙。我二话没说,放下手头上的创作,骑上我那辆早就该换的自行车,飞快地赶到冯牧老师的家。一见面他就对我说:“下一期《中国作家》就要发排了,但有一篇6万余字的中篇小说必须抽下来,怎么办呢?限你三天三夜,必须给我们赶出一篇纪实体的中篇小说。”

我一听蒙了,真不知该如何回答老师的请求,只好为难地摇头不止。

“我记得你写过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叫《鲁迅和小奴隶们》,我看后认为不错,你回去以后,用三天的时间,把它改编成一部6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发表在下一期《中国作家》上。”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即打道回府,两天两夜没有睡觉,就把这部电影文学剧本改编成了6万多字的中篇小说。接着,我用凉水冲了冲头就赶到了冯牧老师的家,双手把稿子往桌上一放,说道:“我提前完成任务,行不行,我不知道。您看后认为不行,就当废纸把它扔在纸篓里。如果你认为还有改的余地,您就大笔一挥,随便改。”

“谢谢柱子,我想是行的。”

我转身走出冯牧老师的家门,蹬上我那辆破自行车赶回家,连口水都没喝,纳头就睡。一觉醒来,也就是天刚放亮,电话铃响了,我迷迷糊糊地拿起话筒,就听到冯牧老师说:“柱子,稿子整体不错,我做了一些删减,把名字改为《鲁迅和青年作家》,请人送走了。”

我如释重负地出了口气,遂又接着睡回笼觉。

一个月后的一个上午,我又接到冯牧老师的电话,他请我赶到他家,说是中午吃他亲手包的烧麦。

我记得听冯牧老师说过,他的父亲是北师大的教授,撰写过一部蒙古史,在当时有着相当的权威性。另外,我还听说烧麦源于北方少数民族,有的人还肯定地说是来源于蒙古族,因此我暗自自问:“冯牧老师会包烧麦,会和这两件传闻有关系吗?”

我赶到冯牧老师家的时候,他基本上包完了烧麦。接着,他又十分熟练地点火蒸烧麦,等到蒸熟的烧麦端上餐桌,我的农民本色就显露无遗,只知大口吞食香甜可口的烧麦,连问冯牧老师为什么会包烧麦的事都忘了。饭后,冯牧老师拿出两本刊有《鲁迅和青年作家》的《中国作家》,客气地说:“柱子,谢谢你,我们的《中国作家》终于发表你的纪实作品了。”

我双手接过飘着墨香的《中国作家》,默默地看了好一阵子,近似哽咽地说:“谢谢冯牧老师,也谢谢《中国作家》……”

或许应了乐极生悲这句老话,正当我还爱不释手地捧读刊有《鲁迅和青年作家》的《中国作家》的时候,一位和我熟稔的评论家打电话告诉我:河北省文联主办的《文论报》刊出了何满子、阿庸写的文章,整整一个版,批评了这部作品。

很快,我找来了这篇批评文章。我非常气



文艺报

2015年6月26日